

当代文学评论参考資料

第二輯

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室 编
資料室

曲阜师范学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电影《北国江南》批判資料索引	102
附录	140
电影《早春二月》批判資料索引	141
附录(一)	201
附录(二)	201
电影《林家鋪子》批判資料索引	203
附录	236
电影《不夜城》批判資料索引	237
附录	259

一、《北国江南》等四部电影的主要問題在哪里？

——关于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和《不夜城》的綜述

我国革命的文艺界和广大人民在批判周谷城和邵荃麟等人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展开了对一些坏电影，坏小说，坏戏剧的批判。其中影响深远，收效最大的是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和《不夜城》的批判。

(一)

由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北国江南》于1964年6月开始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放映。这部影片是以我国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塞外农民打井抗旱、征服大自然的事件为题材的。最初它曾受到一部分观众与评论家的赞扬。马林的《千里塞外变江南》和秦榛的《喜见北国变江南》两篇文章就是这种意见的反映。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观众却认为这是一部坏作品，对那些歪曲事实的赞美声极为不满。1964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汪岁寒、黄式宪二同志的《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

国江南》一文，概括而明确地指出了影片中的主要錯誤。《人民日报》在文章前边还加了編者按語，指出影片和汪、黃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許多根本性的問題，号召大家认真进行討論。随后便在全国各地許多报刊上开展了广泛的、羣众性的討論与批判。在討論与批判过程中，虽然有少数人企图为影片的錯誤进行辯解，但绝大部分同志都認為它是一株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小海子公社小海子大队的貧下中农和干部（影片基本上取材于这里人民羣众的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在影片座談会上，用他們的亲身經歷严厉地駁斥了影片对现实生活的歪曲。他們很准确地指出：“編电影的人根本沒有把脚跟站在咱貧下中农这一邊”。

綜合許多批判文章的主要論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北国江南》以阶级調和論歪曲和抹杀了现阶段的农村阶级斗争。贊扬《北国江南》的人說它自始至終貫串着“一根阶级斗争的紅線”。但是許多同志都正确地指出：这部影片虽然接触到现阶段农村的阶级矛盾，如敌我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等，却沒有正确而深刻地反映出这些矛盾之間的互相斗争，尤其沒有反映出革命的阶级、社会主义的力量，經过对反革命阶级、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取得胜利，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规律。观众只能在影片中看见反革命分子錢三泰和不法資本主义分子董子章勾結在一起，順利地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如肆无忌憚地破坏社会主义建設、搞投机倒把、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等。却看不见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进行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斗争。特別是以

党支部书记兼农业合作社主任吳大成为首的农村党员和干部，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毫无警惕，毫无斗争，对人民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更没有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完全是以调和矛盾的态度去处理各种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这样就使错综复杂而又十分尖锐的农村阶级斗争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第二，《北国江南》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主观主义地描写了一个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化身的“共产党员”——银花。在电影《北国江南》中是以什么东西去调和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的呢？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它所接触的许多矛盾都不是通过阶级斗争，而是通过顽固的资本主义分子董子章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时的“良心发现”和共产党银花的眼泪和“人性”的感化去解决的。尤其是在共产党员银花身上，编导者极力把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倾注到她的灵魂中去，使之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人性的化身。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既不从事生产斗争，也不参加阶级斗争。她是一个“瞎子”，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只会以哪种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去同情人、感化人，并以此代替了对敌人的斗争，代替了对于青年一代的阶级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

第三，《北国江南》是“写中间人物”论的标本。由于影片的编导者不是以阶级观点、而是以人性论为指导去描写人物的，所以出现在电影中的绝大部分人物都成了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具体说来，影片不仅把主要人物之外的群众都写成毫无社会主义觉悟的一群“芸芸众生”，而且也把共产党员吳大成，银花加以“非英雄化”和丑化，使他们

一个成为对敌人毫无警惕，对群众独断专行的旧式农民，一个成为贤妻良母式的弱女子。甚至把仇视社会主义的董子章也写成一个颇有“良心”的老“大伯”。

(二)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三十年前的小说《二月》改编的。1964年9月上半月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上映。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景文师的文章——《〈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并且在《编者按》中指出《早春二月》所提出的問題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大是非問題，即无产阶级文艺究竟应该歌颂什么人物、宣传什么思想，以什么观点对待过去文艺作品中的旧人物，把读者与观众引向哪里去的問題。因此《人民日报》号召大家把这部影片和《北国江南》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于是首都和各省市的报刊上便陆续发表了许多讨论和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这些文章提出和論述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問題：

第一，《早春二月》没有反映出二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影片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26年，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时代。许多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青年都投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大革命斗争。可是电影却根本沒有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沒有接触当时阶级斗争的主流，甚至沒有一点革命的气息。编导者用全力去描写和美化那个与大革命的时代相隔离的“世外桃源”——芙蓉镇，去歌颂那个“厌倦”了斗争生活，竭力逃避现实，逃避斗争的萧涧秋。在影片中除了那班无聊文人和社会帮闲们的情场争夺，“好人”与坏人的冲突之外，人们看不见真正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看不

见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更看不到那大革命时代的英雄人物，听不到历史车轮迅速前进的巨大的声音。

第二，《早春二月》美化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个艺术标本。许多文章都指出：《早春二月》所极力歌颂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而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萧涧秋和陶胤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化身。他们本身远离群众的革命运动，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并一心一意追求那渺小的个人主义的幸福生活、爱的温暖，以资产阶级的“救世主”的态度去同情和“救济”劳动妇女文嫂，并借此向他传授着一种极端反动的活命哲学。影片对这样的人物极尽歌颂与美化之能事，实际就是借助了这样的艺术形象，宣传着那种不论在二十年代或者是在今天都是和革命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想。尤其在今天，这种思想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第三，《早春二月》还表现与宣传了资产阶级极为庸俗的艺术趣味和情调。有人说《早春二月》有一定的艺术性，但不少文章指出：它只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艺术性和艺术趣味。比如其中的梅林散步、月下谈心、西湖畔的徘徊等等的描写，比如其中那低回蒼涼的琴声，疏疏落落的梅花，飘零无定的柳絮，狂风乱卷的雪片，暗淡朦胧的月光，微波荡漾的湖水……都是为表现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卑微的思想感情服务的。影片中许多细节描写都是很庸俗的低下的。比如萧、陶在弹琴时那种忧伤思虑的神情，萧涧秋第一次走出文嫂家之后的自我陶醉等，都是为今天的劳动人民所不可理解的。有的同志还提到，甚至影片中的许多背

景与音乐伴奏也都是为表现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服务的。

(三)

继《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讨论批判之后，从1965年5月下旬开始，广大观众与评论家又展开了对《林家铺子》和《不夜城》两部影片的批判。《林家铺子》是夏衍根据三十年代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最初上映于1959年。《不夜城》创作与拍制于1957年（柯灵编剧汤晓舟导演），上映于1965年5月。这两部影片都是以描写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內容的，因此在批判中许多同志都指出了它们的共同的错误倾向。

第一，这两部电影都美化了资产阶级。许多批判《林家铺子》的文章都指出：影片以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但是却不去揭示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反而为资本家涂脂抹粉。林老板象所有的资本家一样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而改编者却把他打扮成“老好人”、“规矩人”。不仅店员与他亲如一家，连贫苦的农民也夸他待人厚道，影片企图使人相信：林老板的一切都是值得同情的。批判《不夜城》的许多同志也指出：影片中宣扬资本家是“勤劳起家”，其目的就在于为资产阶级血迹斑斑的剥削行为开脱。编导者也对资本家张伯翰的两面性作了错误的描写，片面地强调了他的爱国思想与行为，却抽去了其爱国性的阶级实质，掩盖了其动摇，妥协和反动的一面；片面地强调了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甚至描写他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积极要求公私合营，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却有意掩盖了其反

社会主义的阶级实质。

第二，这两部影片都丑化了工人阶级。《林家铺子》的编导者把店员工人写得对资本家忠心耿耿，服服贴贴，整日为老板奔波劳碌，出谋划策。象寿生那样的人正是店员工人中的败类，只能当作批判的对象。而编导者却硬是把他作为正面人物去歌颂，这实在是对工人阶级的丑化与侮辱。《不夜城》中的工人也没有工人阶级的气概。他们在解放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软弱无力，在解放后也不能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向资产阶级展开不妥协的斗争。银弟等明知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顾工人安全，可是却丧失了立场，放弃了斗争，以致造成工伤事故。瞿海生大慨工人之慨，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个人私仇，并声言工人阶级对剥削和压迫自己的资产阶级“不记私仇”，要把资本家“带入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影片的编导者正是这样把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写成了资本家的代言人和辩护士。

第三，这两部影片都掩盖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实质。《林家铺子》宣扬了资本家与店员的和睦共处，同舟共济。实质上就是鼓吹阶级合作，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不夜城》没有写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斗争，没有写出资本家以五毒行为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只描写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感激”，描写了资本家和平地走入社会主义。最后以庆贺公私合营的皆大欢喜结束。实质上也是在宣扬阶级斗争息灭论，宣扬“合二而一”论。

(四)

在批判以上四部电影的斗争中，许多同志都正确地分析了产生这些坏电影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指出了今天彻底批判这些电影的重大意义。

第一，这些电影的共同特点是歪曲现实斗争或历史真实，美化资产阶级，宣扬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宣扬矛盾调和与阶级合作，所有这些都是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战斗任务背道而驰，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不谋而合的，都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彻底批判。否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第二，以上这些坏电影的出现决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它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具体反映。也是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其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等人的“写中间人物”论是一样的。对这些坏电影的批判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兴无灭资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重要规律之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是一定要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的。文学艺术自然也是他们用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并企图按照这一世界观改造世界的形式之一。我们不让它表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们表现出来后，我们不进行认真地批判与斗争，那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第三，这些坏电影中所宣扬的一系列錯誤思想，都是編导者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包括人生觀与文艺觀）的直接表現。他們虽然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但是却远远地脱离了社会主义时代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因此他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主义社会或者資本主义社会里。这次斗争生动的告訴我們：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使之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家、艺术家及一切文艺工作者，必須活学活用毛澤东文艺思想，必須深入工农兵羣众的斗争生活，进行彻底的思想感情的改造。

二、批判《北国江南》的 重要論文选輯

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評論影片 《北国江南》

汪岁寒 黃式宪

人民日报編者按 今天本报发表的汪岁寒、黃式宪两同志的文章，对影片《北国江南》以及七月十九日本报发表的馬林同志的影評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这部影片在怎样反映时代精神，怎样正确反映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人物，怎样对待中间人物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問題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錯誤。

汪、黃两同志所提到的这些問題，也是目前文艺工作中从理論到創作实践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我們希望讀者积极参加对《北国江南》这部影片的討論，以期通过这次討論，端正創作思想，提高認識水平，坚决貫彻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綫和方

針，使文学艺术更有力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馬林同志評論电影《北国江南》的文章——《千里塞外变江南》（刊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对这部影片作了极其錯誤的評价。这部影片，在怎样正确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形象，怎样正确对待中间人物在創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根本性的問題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錯誤，值得我們严肃、認真的討論。

馬林同志在文章一开头就說：《北国江南》“是一部描写人民羣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变塞外为江南的贊歌”，并強調指出：“这部影片所描写的虽然是一场战胜自然的斗争，却是用一根阶级斗争的紅綫貫串着”，“通过与阶级敌人的斗争展示出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塑造了主人公吳大成的光輝形象”。

《北国江南》真的是这样一首“贊歌”嗎？真的“是用一根阶级斗争的紅綫貫串着”的嗎？真的塑造了“光輝形象”嗎？

看不見“阶级斗争的紅綫”

影片情节发生在合作化时期风沙漫天、荒涼瘠貧的千里塞外。影片作者也写了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影片反映的“阶级斗争”的一个触目特点是：敌人在猖狂破坏，而羣众、干部和党员却长期沒有感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更沒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斗争。結果是：我們搞建設，敌

人搞破坏；我們打井要改造自然，敌人就移动标石叫我們白費氣力打不出水來。虽然影片將近結束的時候，縣委書記指出了這一點，但是，作為合作社社長兼黨支部書記的吳大成，也僅僅是引起懷疑，仍未及時追查敵人。

這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是怎樣解決的呢？也不是由於對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自发勢力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而是由富裕中農董子章突然轉變，“良心”發現，跑來揭發，才算真相大白。

董子章是怎樣轉變的呢？他的轉變是自發的，偶然的，并不是接受了正面人物的正確思想影響然後發生轉變的。

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引一段戲為例：富裕中農董子章受了反革命錢三泰的唆使，企圖對合作社的牲口下毒，但一看到自己入社的那兩頭牲口時，心就軟了。在分鏡頭劇本中是這樣描寫的：

“董子章走過來（進畫）到牲口前，親熱地望着它們，撫摸它們，不由己在馬頭前矛盾起來。”

“紅馬和大青驃，看見董子章的這副樣子，好象頗有靈性地緊着搖頭。”

“董子章酒氣未盡，滿臉汗光，伸手掏出毒藥來，就在這時一陣冷風吹刮得他須發飄動，他不禁哆嗦了一下，而头脑也好象有點兒清醒（了）。”

從這些描寫可以看來：影片的作者企圖用這樣的事實說服觀眾：董子章在此時此地由對牲口的感情而“良心”發現沒有下毒，加上事後受到暗藏反革命分子錢三泰的威逼，從而很快轉變。只要稍具階級鬥爭的觀點，就不難識破董子章這樣的人物的這種轉變，是不真實的，是十分牽強的。

在評論双方爭奪小旺這個重要情節的時候，馬林同志說：這“就是思想領域中的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那麼，這場鬥爭到底是“誰战胜誰”了呢？從影片的描寫看，董子章從弄斷車軸、販私貨做生意到和吳大成爭奪小旺，甚至險些在暗藏反革命分子錢三泰的唆使下對社里的牲口下毒，活動甚為囂張。尤其是小旺，竟輕易就被董子章這個富裕中农拉了過去，而吳大成等實在顯得軟弱無力，他們使用的主要鬥爭手段是：發脾氣冒火（吳大成）、哭鼻子抹淚（銀花）、打架動武（明新）、躲在一邊干着急（鳳蘭、桂芬），別無他法。

由此可以看出，影片表面上是寫了“階級鬥爭”。然而，影片絕大部分篇幅描寫的，却只是資本主義自发勢力的囂張活動以及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人們並看不見革命人民對他們的鬥爭。

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學說教導我們：階級鬥爭總是敵對的兩個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鬥爭中，革命階級總是促成事物發生革命轉化的決定性力量；但是，為促成革命轉化、战胜反動階級，必然就要經歷一個鬥爭過程。所以，革命的文學藝術工作者，要想在自己的作品中正確反映出我國當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階級鬥爭，那就不能仅仅只寫階級之間的對立，更重要的，還必須寫出對立階級之間經過激烈的鬥爭所必然導致的革命階級勝利的革命轉化過程。而這恰恰是這部影片所缺少的。

《北國江南》沒有表現出人民羣眾在黨領導下的革命實踐、革命鬥爭的真正勝利，沒有用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革命的辯証法來概括、提炼與反映社會生活中的矛盾鬥爭。

影片中虽有一些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冲突，但是，在影片所描写的这场矛盾冲突中，革命阶级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也不决定于我們的斗争和强大的思想力量，而是决定于所謂“良心”、“人性”以及抽象的“感情”，等等。这怎么能构成“一根阶级斗争的红线”呢？

并不是我們时代的“光輝形象”

是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映时代精神，首先表现在文艺作品歌頌什么人物以及怎样歌頌这个问题上。这里，讓我們分析一下影片所塑造的“光輝形象”吳大成。我們認為，只有在作品中，塑造出直接从当代火热斗争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才能深刻、有力地体现我們今天的时代精神。

影片中作为合作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吳大成这一人物，是怎样的形象呢？

馬林同志說：“影片在矛盾冲突的漩涡里，塑造了主人公吳大成的光輝形象”。“影片通过吳大成克服缺点的描写，表现了他的成长”，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农村干部的形象”。便在我們面前“矗立起来”。

类似这样的評論，也可以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光明日报》上看到：影片着力刻划了吳大成这个忠心耿耿的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影片“展现出他的坚毅性格和鲜明的阶级观点，展现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和高尚的精神境界”。